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理论品质

■ 陈 红[1] 代长彬[2]

唯有具备鲜明品质的理论，才能绽放出直抵人心的真理力量，并为实践的推进赋予科学的指导意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家发展全局，立足民族复兴伟业，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深植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根基，把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层面，就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构筑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深入学习和深刻理解其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理论品质提供了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具有坚毅执着的人民立场、宏阔高远的系统思维、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笃行担当的实践导向，以鲜明的时代特质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一、坚毅执着的人民立场

坚毅执着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识。“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这一科学论断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形象体现，表明健康中国建设的根本旨归与最终归宿始终是人民群众。人民健康是最为珍贵的财富，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后边的0。1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生动比喻，揭示了健康在人民幸福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人民始终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其分量也最为厚重，他始终将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治国理政的关键战略方位，着重强调要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这种坚毅执着的人民立场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进入新时代，直面人民群众多元化、高质量的健康需求，必须统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得到提升，为实现中国梦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二、宏阔高远的系统思维

健康中国的构建是多维度、整体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具有宏阔高远的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贯穿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全过程，体现了对健康事业全局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的深刻把握。健康中国建设不只是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的单一事项，更是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整体战略部署；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靠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举措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更需要凝聚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系统合力，通过整体协同、综合施策的方式统筹推进。建设健康中国，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将健康要素纳入所有政策体系，推动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实现良性协调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涉及卫生健康、教育、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覆盖、整体推进、协同配合。全面覆盖就是要从预防、治疗到康复，从医疗服务到健康环境，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整体推进就是要通过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健全健康保障体系、打造健康宜居环境、培育壮大健康产业，构建各环节紧密衔接的有机整体；协同配合就是要强调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治理格局。

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国运兴衰根植于文化盛衰，民族强弱依托于文化底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两个结合”时代诉求下，系统开发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卫生健康资源，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明确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时代价值和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健康中国建设的整体框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博大精深的健康理念与养生智慧，蕴含着天人相应、起居有常、养德养生等丰富思想资源，不仅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认知，而且强调生活节律、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的内在统一，探索并形成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养生实践经验。深入挖掘并传承弘扬这些文化财富，能够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人民健康素养提供深厚文化滋养与重要实践经验。在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独特作用与时代价值，深刻阐释了中医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中医药不仅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宝贵结晶，更是承载着民族智慧与实践经验的文化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生命健康、疾病防治与养生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知与实践积淀。新时代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也是当代中国厚植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的要求。比如，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治未病思想，倡导注重预防、调养为先等健康理念，与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所坚持的预防为主原则内在契合。二者在价值追求上高度统一，共同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重要转型，推动健康服务逐步从聚焦疾病治疗，向全人群、全方位的健康预防与促进转变，有助于实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四、笃行担当的实践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人民健康保障的现实需求，为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各项任务提供具体指引，彰显出强烈的实践导向。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健康中国建设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破解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薄弱等现实难题；通过推行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使健康要素全面融入各类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逐步形成有益于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现阶段，我国已构建起全球体量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实现大幅增长。立足新发展阶段谋划健康中国建设，是党和国家对全体人民的责任与承诺，各级党委、政府须将该项惠民工程列为重点工作，强化责任落实与使命担当，用切实行动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见行见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被党中央正式纳入国家战略体系，通过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行健康中国行动等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了清晰的大政方针与行动指南。这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体现了对健康事业的系统谋划和长远布局，这种制度化、系统化的实践路径，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日益彰显出更加强大的实践伟力。

基金项目：2022年安徽省科研编制计划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AH040273）；蚌埠医科大学质量工程项目“习近平健康与卫生重要论述融入医学院校‘概论’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3jyxm21）；蚌埠医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MYRWSK05）。

（作者单位：1.蚌埠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I视觉检测在智能制造质检中的精度分析与风险治理

■ 曹正良 殷 莉 田 浩 方勇川

一、绪论：智能质检技术的应用困境与防控必要性

在当前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产品在完成装盒与装箱后的终检环节，正逐步由人工目检转向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自动检测模式。借助工业相机采集图像信息，并结合智能算法对包装状态进行分析，可以实现对箱体破损、缺条等问题的快速识别，从而提升检测效率并推动产线智能化升级。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多种环境与工况因素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干扰。例如，光照变化、表面反光以及拍摄角度偏移等，都可能导致识别偏差：细微裂纹被忽略、缺条情况被遮挡掩盖，甚至正常包装因色差被误判为异常。此外，由于深度学习模型具有一定的不可解释性，现场人员往往难以理解其判断依据，一旦出现误判，容易造成合格产品被错误剔除，增加企业成本。因此，有必要围绕数据反馈、模型优化及标准管理等方面，构建一套系统化的视觉质检控制体系，以降低误判风险，提升检测结果与实际质量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二、构建动态数据反馈与算法校准机制

为提升AI视觉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企业建立持续的数据反馈与模型修正机制，将检测输出与真实质量表现进行对照分析。该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闭环数据流，识别模型判断与实际质量之间的偏差，并据此对算法进行针对性优化。

在实施过程中，整合物流破损数据、客户投诉信息以及售后退货记录等多源数据，例如，运输损坏率、缺条反馈比例及包装满意度等指标，并与AI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当发现某些检测特征与实际质量关联性较弱时，应及时调整模型权重，避免单一指标对结果产生过度影响。通过反馈机制，可以识别这一偏差，并强化对内部结构或缺条情况的检测能力，从而提高整体判定的准确性。持续的数据驱动优化，有助于使检测标准更加贴近真实质量需求。

三、推行检测标准透明化的分级披露制度

在质量管理过程中，引入分层次的检测标准披露机制，有助于提升系统透明度并增强多方信任。其核心在于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对检测逻辑进行差异化展示，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合理公开。

对于外部合作方或客户，可以披露基础检测维度，如包装完整性、封装规范以及缺条判定规则，使其了解质量控制的重点，减少认知偏差。对于企业内部，则应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包括模型参数、训练数据特征及判定逻辑，以支持质检人员对结果进行解释和监督。通过建立分级信息管理体系，一方面可以提升质量管理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争议，促进质量控制体系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四、设计分级质检与人工抽检复核机制

在AI视觉检测基础上，引入分级质检与人工复核机制，可以有效弥补算法在复杂场景下的局限性。通过对不同置信度区间的检测结果进行分类处理，使质检流程更加灵活且可靠。对于处于判定边界的样本，例如，接近正常与异常临界值的产品，可安排经验丰富的质检人员进行二次审核，以判断是否存在因环境因素或模型偏差导致的误判。同时，当检测结果与历史质量数据或批次特征明显不一致时，也应触发人工干预，以防止潜在问题被忽视。

在实施过程中，应明确复核触发条件与操作流程，并重点关注缺陷严重程度、功能影响及修复成本等指标。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误判带来的风险，还能为模型优化提供持续的数据支持。

五、建立产品特性导向的质检策略优化框架

为进一步提升质检决策的适配性，可构建以产品特性为导向的检测策略优化框架，将AI视觉检测的应用与具体产品属性相结合。该方法强调根据不同产品的结构复杂度、价值水平及易损程度，对检测方式进行差异化配置。例如，对于高价值或结构复杂的产品，仅依赖视觉检测可能难以全面反映其内部状态，此时应适当降低AI检测权重，并增加人工检验环节，以获得更准确的质量评估结果。

在实际应用中，可从易损性、复杂度及价值等级等维度对产品进行分类，并据此设定AI与人工检测的比例。同时结合历史数据评估不同类别产品的检测效果，不断调整策略，以实现风险控制与效率提升之间的平衡。

六、结语

综上所述，AI视觉检测在提升智能制造质检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应用过程中仍伴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通过构建数据反馈与模型校准机制，可以不断提升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推进标准透明化，有助于增强信任与监督；通过引入人工复核机制，可有效弥补算法不足；结合产品特性优化检测策略，则能够实现更具针对性的质量控制。

（作者单位：四川中烟有限责任公司西昌卷烟厂）

基于教学管理视角的大学生思政课参与度提升研究

■ 张文秀

一、引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载体，大学生对思政课的价值认同与行为参与的协同性直接关乎课程育人实效。笔者在实证调研中发现，当前思政课教学中存在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现象：大学生对课程的价值认同普遍较高，但此种认知层面的认同，却未能在课堂上充分转化为广泛、积极、深度的行为参与，这种“高价值认同—低行为参与”的背离现象，构成了制约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成效进一步提升的深层矛盾。本文基于笔者在一线教学管理岗位开展的专项调研，从管理视角审视这一矛盾，探索从教学供给、评价激励、制度环境三个维度解构矛盾成因，解析阻碍学生参与行为生成的关键瓶颈，提出“教学适配—评价体系构建—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旨在推动大学生从对思政课价值认同向课堂参与行为投入转化，为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提供实证参考与实践指引。

二、实证诊断：高认同度与低参与度的现实背离

基于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和思政课教师、在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对大学生思政课参与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当前学生在思政课学习上呈现出显著的认知与行为分层现象，价值认同的高位状态与课堂参与的低频表现之间，构成了鲜明的现实背离。

首先，在价值认知层面，学生表现出高度且稳定的认同。数据显示，学生对思政课“个人成长价值”的认同度达86.43%，78.32%的学生认为思政课有助于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体现出对思政课价值的高度认同。访谈中，多数学生表示“思政课讲的道理很有意义，能帮助我们看清社会现象”，情感上对思政课持肯定态度。这表明，课程的宏观价值已得到大学生的广泛接受。

然而，在课堂行为层面，与高价值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参与行为呈现显著的被动性。一是参与广度不足，从就座情况看，56.32%的学生选择座位时随机或靠后，仅24.34%的学生主动选择前排；从互动频率看，仅21.06%的学生几乎每节课主动参与互动，55.54%的学生仅在对话题感兴趣时偶尔参与，23.4%的学生除非被点名否则不参与。二是参与深度欠缺，从课外学习情况看，仅38.65%的学生课前会主动预习，45.24%的学生课后会梳理课程知识点，多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度思考与探究，在小组调研等合作学习中，存在“浅层附和”与“搭便车”现象。

三、归因分析：制约课堂参与度的机制短板

从教学管理的流程与要素进行剖析，大学生思政课参与度不足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关键环节的机制性阻滞：

1.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的适配度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内驱力。从供给侧改革理论视角来看，教学供给的质量水平，是衔接价值认同与行为参与的核心环节，其与学生需求的契合程度，直接影响认知层面向行为层面转化的效果。而在实际教学组织实施过程中，部分课堂教学过度侧重教材体系的完整呈现与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却未能及时、有效地捕捉并回应学生的思想动态、现实关切及认知兴趣点，未能将理论与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有机融合，这就很容易造成教学内容“供给端”与学生内在“需求端”的错位。当课程内容被学生感知为与自身成长体验关联度低的“外部知识”时，便难以激发其将理论知识融入自身思维框架、主动开展探究学习的强烈意愿。调研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76.37%的受访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吸引力是驱动课堂参与的核心要素，而超过80%的受访学生表示，提升课程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将时事热点与专业相关元素有效融入课堂教学。

2.过程性考核的导向功能发挥不够充分，难以有效塑造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根据教育评价理论，过程性考核能起到引导学生学习行为、激发学习动机的积极作用。然而，在高校思政课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现实背景下，这一考核机制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班级规模通常达百人左右，部分课堂甚至超过百人，教师在组织过程性考核方面面临一些压力，例如，在有限课堂时间内，难以实现每次课都对全体学生逐一点名考勤，更难以系统、持续地记录和评估每位学生在课堂互动中的具体表现，如发言次数、思维深度及讨论中的实际贡献等。同时，过程性考核反馈往往滞后或缺失，学生一般要到学期末查询成绩时才能知道过程性考核的成绩，这样一来，尽管60.64%的学生在认知层面认可课堂互动对学业评价的积极意义，但是缺乏明确细致的评价指引与及时的评价反馈，学生会觉得课堂参与与否对最终总成绩影响不大，就会缺乏参与课堂讨论和互动的积极性。

3.制度保障体系的协同性不足，弱化了学生课堂参与的外部支撑力度。一方面，教学运行制度的协同缺失扰乱了课堂参与的稳定性。调研显示，57.41%的缺勤行为源于“院校活动与课程时间冲突”需要请“公假”，反映出校园活动安排与课程安排没有形成有效衔接，课程在全校管理体系中的优先级未被制度性确立，其严肃性与规范性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学生管理的严格程度对课堂参与也有一定影响，调研发现，51.48%的学生认为“假条审批宽松”会影响自己的出勤，而通过和任课教师的访谈发现，对学生管理规范、严格的学院，学生思政课出勤率高，而管理松软、批假条相对不规范的学院，学生整体出勤率偏低。由此可见，如果学生管理制度执行的严肃性与人文关怀出现失衡，会导致制度的约束与保障作用弱化。

四、提升路径：构建“三位一体”的课堂参与促进机制

1.优化“精准供给”机制，以内容吸引力激活学生的参与动力。建立常态化“学情—教情”双向反馈联动机制，通过青马班交流、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定期收集并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点与知识困惑点。教研室围绕重大时事热点、理论研究前沿、青年学生发展需求等核心主题进行备课，动态更新教学案例库，推动教学供给模式从“大水漫灌”式粗放供给向“精准滴灌”式个性化供给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提供内在动力牵引。

2.构建多元化过程性评价体系，强化激励导向作用。调整评价指标权重，明确课堂参与度在过程性评价中的核心地位。细化课堂参与评价指标，包括主动发言次数、讨论发言质量、小组合作表现、课堂展示表现等，可探索采用“教师评价+学生互评”的方式进行综合打分；同时，将作业完成质量、实践活动参与情况等纳入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差异化设置评价指标——如对理工科学生，可侧重其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表达能力评价；对外语类学生，可鼓励其用双语参与课堂讨论并纳入评价激励。

3.统筹整合资源，提升支撑保障能力。强化师资资源统筹与培训，建立思政课教师教学协作机制，教研室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教学观摩与专题研修等活动，共享互动教学案例与经验；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互动教学能力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优秀教师开展专题讲座，提升教师的课堂互动设计与组织能力。针对外语类院校思政课教学需求，可组织教师参与跨文化教学相关培训，增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背景的契合度。优化教室、智慧教学平台等硬件资源配置，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常态化；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将思政课教学安排优先嵌入校历与大型活动统筹流程，确保课时刚性落实。同时，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等“第二课堂”深度融合，使课堂所学的价值观念在更广阔的实践场域中得到体验、验证与强化，进而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五、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大学生对思政课“高价值认同—低行为参与”的背离现象，并非源于学生对课程价值的否定，而是教学供给、评价机制与制度环境在管理层面未能形成有效支撑所致。破解这一矛盾，作者从管理视角出发，提出“教学适配—评价激励—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以精准供给回应学生成长需求，唤醒参与内驱力；以多元评价强化过程引导，塑造参与行为；以系统制度优化育人环境，稳固参与常态，推动高校思政课的育人价值从认知认同真正落地为行动自觉。

基金项目：2025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级教育教学管理研究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路径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人机关系的异化与终结

■ 黄惟邦

继人工智能会下棋、绘画之后，Open AI近期发布的Chat GPT进一步会做题、会编程、会写文章、会创作音乐……曾几何时，这些需要人类思考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依靠机器就完全可以实现。如果机器的算法可以取代人类的思考，那么，人类该如何安放自身？为此，追溯并预判人与机器关系的历史与未来，就变得相当迫切且重要。

一、“人是机器”：人的异化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人类始终面临的一个困惑是：到底是“技术服务于人”还是“技术奴役了人”？面对这一追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人类，主要给出了“人是机器”的答案。

“人是机器”的答案，在《摩登时代》中有细腻、深刻的刻画。作为一部喜剧电影，《摩登时代》在描写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冲突时，却透着些许悲凉与无奈。其中，卓别林饰演的工人被强制进入流水线作业。然而，机器化的生产流程让他无所适从，最终在一次意外中被卷入机器的齿轮中。尽管手、脚和头不断地被压扁，但他还是像机器人一样，继续不断地移动、扭动和挣扎，并且始终保持着拧螺丝的意识。甚至在遇到穿有两颗纽扣的妇女时，也会条件反射地做出拧螺丝的动作。这部无声电影是对人类的一个警醒：在程式化的工作中，人不再需要思考，在无数次地重复机械动作后，最终异化成了生产螺丝的机器。

需要强调的是，人不仅无需思考，甚至连情感、意志与思想也都不再需要。《摩登时代》中的一个细节是，为了让工人在吃饭时不耽搁工作，工厂试用自动喂食机。工人坐在机器上，接受机器送来的食物，但在喂食玉米的时候，机器突然出现故障，一直不停快速转动，玉米棒在工人的脸上来回抽拉，然而工人的手还在继续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人不具有情感、意志、思想，而仅仅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已。作为机器的奴隶，人过着一种机械的生活，配合机器，最后成为机器。质言之，人服从于机器，而非机器服务于人，技术由此成为一种外在的、压迫性的力量。

无疑，机器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过分追求机器，机器权力主导并限制人以后，人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机械，被异己的力量所驱使、所奴役。失去自我和人性的人，由此被当作工具或资源加以利用。而人作为人、成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似乎已荡然无存。

二、“机器是人”：机器的异化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机器开始具有“自我意识”，从模型驱动到意图驱动的智能化发展，驱使人与“机器”的关系，由初始的“人是机器”，逐渐转向了“机器是人”。

具体而言，1997年，美国IBM公司研制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雄踞世界棋王宝座12年之久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2016年，美国谷歌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韩国棋王李世石，并于2017年击败中国天才棋手柯洁；2022年，谷歌公司开发AI绘画生成器Mid journey，其画作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艺术比赛第一名；2023年，Chat GPT在众多领域取代人的思考与工作；2025年，Deepseek爆火出圈。于是，人们依赖导航放弃方向感，依赖推荐算法放弃选择权，依赖语言模型放弃思考，记忆、判断乃至创造等人类核心能力已被人工智能外包。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已经越来越贴近或对齐人类偏好，必将深度影响、甚或重塑人类演进的规则。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机器逐渐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成为一个自我演化的系统，并最终衍生出自己的意志的情形下，人类该如何安置自己？无疑，“机器是人”将给人带来机遇。作为学生，通过链接Deepseek，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可以得到更快速和多样的解答；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可以找到更便捷和畅通的沟通渠道。由此，机器作为手段，使人能利用技术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完成自我的进化和提升。然而，“机器是人”也给人带来挑战。

首先，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类可能将无用武之处，致使人的器官也将退化，最终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其次，人在智能手机等机器上花的时间越长，越会沉浸在虚拟世界里，导致自身的交往能力受到极大的减损。更重要的是，“机器是人”可能导致机器自身的异化。因为机器具有人的意识后，意味着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在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或者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形下，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面对类人的机器，人类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事实上很难追究机器的法律责任。

质言之，机器仅仅似人，而不能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否则，人将被机器圈养，并再次丧失自己的主体性。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人应理性地看待自己与机器的关系。

三、“人机共生”：异化的终结

面对机器，人类又爱又惧、或爱或惧。然而，机器始终无法彻底取代人类，人类似乎也不可能完全战胜机器。理性的人类，应该成为机器的尺度，与机器共生。

智能化时代，机器具有与人类思维类似的记忆、学习、推理和联想等能力。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尽管AlphaGo在围棋比赛上对人取得了胜利，但这并非人工智能的全面成功，仅仅是人工智能在游戏上接近人类水平。这种机器对人类思维的简单模拟，基本上没有或还有少量的自主意识，非但不会对人类产生威胁，反而会成为人类的帮手。如果机器拥有自主意识，则意味着机器具有类人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可能导致机器控制或统治人类。因此，人类应在智能化阶段，通过人机共融，实现“人机共生”。

“人机共生”意味着人类将与人工智能结合。典型的场景，比如，在医疗诊断中，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分析，医生综合伦理、情感与病史做出最终判断，人类思维与机器智能实现了互补增强；比如，在交通管制中，自动驾驶接管高速巡航，人类负责复杂路口，人类意图与机器执行实现了无缝协同；比如，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中，脑机接口恢复沟通能力，技术内嵌于人的身份与体验。由此，共生不是主仆、不是敌我，而是相互塑造、协同进化。

实现人机共生，在技术设计上，应秉持机器“增强”而非“替代”人的基本目标，比如，手术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应由医生操控，机器没有自主决策；在制度保障上，应确立“人类最终责任”原则，比如，任何人工智能的输出，最终的责任主体必须是人；在文化重建上，应坚守“人类中心主义”，既要拒绝“机器万能论”与“技术恐惧症”，又要承认人类有局限，机器有边界，唯有人机协作才是突破的路径。因此，不限于也不仅仅终结异化，“人机共生”可以在科技发展的同时强化对人性的关注，是划定科技与人性合理边界的有益方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人机共生的前提是保留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若人完全变成机器，或机器完全模拟人，共生即告死亡。因此，我们不仅应警惕那些使人丧失独立思考、情感共情以及道德判断的算法依赖；还应反对那些模糊人机界限的技术融合。同时，应推动公共算力平台、数据合作社等开源模式，借此避免少数科技巨头垄断智能基础设施。质言之，人机共生不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主动的文明选择——最好的技术，不是让我们更像机器，而是让我们更像人。当机器能写诗、作曲、诊断疾病，人类的价值恰恰在于明知算法最优，仍选择最爱；明知数据真相，仍相信希望；明知世界荒诞，仍创造意义。

四、结语

人与机器之间的“终结”，不应理解为对抗的终结，而应是异化关系的终结。即终结那种将人工具化、数据化以及边缘化的技术逻辑。真正的解放，不在于人拥有多少智能机器，而在于人是否依然保有提问、怀疑、创造与共情的能力——这些无法被算法复制的人之为人的光辉。唯有如此，机器才能回归其本位，不是人类的主人，也不是人类的对手，而是人类文明延展的忠实伙伴。

（作者单位：广州市第三中学）